

寻找真理

——
苟坝会议十五问

杨生国
编



献出版社

寻找真理

——苟坝会议十五问

杨生国 主编

中央文献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寻找真理：苟坝会议十五问 / 杨生国主编.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7

ISBN 978 - 7 - 5073 - 4111 - 9

I. ①寻… II. ①杨… III. ①中国共产党—会议—遵义县—1935—问题解答 IV. ①D235.734 - 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155417 号

寻找真理——苟坝会议十五问

主 编：杨生国

责任编辑：李庆田

封面设计：孙彦红

责任印制：寇 炫 郑 刚

出版发行：中央文献出版社

地 址：北京西四北大街前毛家湾 1 号

邮 编：100017

网 址：www.zywxpress.com

发 行：中央文献出版社

新经典文化有限公司

销售热线：中央文献 010 - 63097018、66183303

新 经 典 010 - 68423599

电子邮箱：中央文献 zywx5073@126.com

新 经 典 editor@readinglife.com

排 版：北京方方照排中心

印 刷：深圳市国际彩印有限公司

710 × 1000mm 16 开 10.75 印张 116 千字

2014 年 8 月第 1 版 2014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073 - 4111 - 9 定价：30.00 元

本社图书如存在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在 上 海，我们寻找中国革命发源的起点；
在 井 冈 山，我们寻找中国革命成功的道路；
在 遵 义，我们寻找中国革命辉煌的转折；
在 苟 坝，我们寻找中国革命胜利的真理！

目 录

序一	徐 静 (1)
序二	费侃如 (3)
苟坝会议概况	(5)
为什么说是毛泽东亲自为苟坝会议定名?	(9)
为什么不能进攻打鼓新场?	(12)
为什么说苟坝会议才真正确立了毛泽东的 军事指挥权?	(24)
真有一封神秘的电报吗?	(34)
为什么说马鬃岭分兵可与“空城计”媲美?	(42)
参加苟坝会议的人员有哪些?	(48)
苟坝会议有什么样的历史地位和作用?	(50)
三渡、四渡赤水是否茅台策划还是苟坝策划?	(58)
为什么说苟坝会议在民主集中制实践方面 优于遵义会议?	(63)
苟坝会议的精神是什么?	(71)
苟坝会议是如何发掘的?	(76)

对苟坝会议的研究与宣传有哪些?	(94)
“新三人团”名称是如何确定的及以谁为首?	(100)
“新三人团”是何时取消的?	(107)
“新三人团”有哪些历史功绩?	(117)

附 录

苟坝的呼唤	(131)
苟坝革命遗址	(141)
苟坝红军标语	(146)
中央红军在遵义的“1234567”	(151)
中央军委前敌司令部鸭溪会议	(154)

后 记	(160)
-----------	-------

序 一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著名的遵义会议召开，会上毛泽东增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毛泽东真正掌握中央红军的指挥权，确是在遵义县枫香的一个小村子——苟坝。3月10日至11日，中央政治局在这里讨论是否进攻打鼓新场（今金沙县城）；12日，成立以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为成员的三人军事小组（又称“新三人团”），全权负责指挥军事——这就是苟坝会议。由于多种原因，苟坝会议鲜为人知，一直藏在深山人未识。

从20世纪80年代起，遵义的党史专家通过不懈“发掘”，终于使苟坝会议的史实逐渐呈现在世人面前。2005年10月，本书作者杨生国调到新组建的县委党史研究室工作，对仍处在风雨飘摇中的苟坝会议会址感到揪心。从事党史工作8年，就为苟坝会议会址的保护、开发呐喊8年。近年终于有了成效，会址修复了；整体打造苟坝会议红色旅游景区的工作启动了。在这一过程中，作者在借鉴前人关于苟坝会议史实的基础上，将研究所得成果编纂成稿——《寻找真理——苟坝会议十五问》，试图寻找到属于苟坝会议自己的特色和闪光点，不为遵义会议的光芒所掩映。

作者以提问的方式直奔主题，既有对苟坝会议内容的介绍，又有对苟坝会议精神的思考；既吸纳了前人的成就，又有个人的真知灼见。本书首次提出了“苟坝会议”概念是由毛泽东定名、苟坝会议的精神内涵、苟坝会议在民主集中制的实践方面优于遵义会议的观点，驳斥了三渡赤水、四渡赤水是在茅台策划的提法（应在苟坝策划）。多数文章提到“新三人团”时，重在研究其成立时的情况，而对“新三人团”的功绩及其取消的情况鲜有提及，本书专设《“新三人团”是何时取消的？》、《“新三人团”有哪些历史功绩？》两问试作回答。用《为什么说马鬃岭分兵可与“空城计”媲美？》一问澄清在马鬃岭发生“战役”的错误认识。用《苟坝会议的史实是如何发掘的？》一问介绍了党史界前辈为发掘苟坝会议所作出的艰辛努力。

作为贵州党史工作的负责人，看到一个基层党史工作者在处理繁重的日常事务之余，仍能倾心钻研，并且取得了这样一个可喜的成果，我倍感欣慰，欣然作序，期望本书能对读者有所启示。

中共贵州省委党史研究室主任 徐 静

2013年12月12日

序 二

还是一年前，生国同志把他写的《寻找真理——苟坝会议十五问》书稿交给我看，并请我为此书作序。按照时下出书的惯例，序应请有关领导同志写，这样不仅可增加书的份量，可能出书还会顺利些。以后又见了几次面，说到写序的事，我还是认为在职领导写为好。最近，他告诉我书稿已交出版社，只等我的序了，这才使我感到他一直要我写序不是客套话，真诚是不能拒绝的，只得尽力而为了。

生国同志这本书书名取得好，即把苟坝会议有关问题提出来了，又用史料逐一进行说明，具有一定学术价值。苟坝会议，是20世纪80年代初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在调研遵义会议专题时，才提出来的，应该说是党史研究中的一个新课题。经过党史工作者30多年来的研究与探索，这次会议成立的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军事小组，全权指挥军事，这在红军长征的战争环境，它是中央最重要的领导机构。毛泽东进入三人军事小组，表明了遵义会议确立的新的中央的领导地位在党内得到了进一步巩固。也标志着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是遵义会议继续完善过程中的一次重要会议，这些已在党史学界取得共识，而载入史册。自此，苟坝这个群山环绕的小山村，登上了大雅之堂，成为贵州红色旅游的一个亮点。

由于受到档案资料的局限，苟坝成立的三人军事小组的一些具体问题，在党史学界仍有不同的意见，如三人军事小组谁为首？有说周恩来，有说是毛泽东；三人军事小组准确成立的时间；王稼祥为何进入小组？朱德又为何不是小组成员等等，都是党史界值得再深入挖掘史料，作进一步研究和探索。因此，生国同志这本书也不可避免地未能解决这些问题，是不能求全责备的。然而，生国同志作为苟坝所在地的遵义县党史研究室主任，具有天时、地利、人和的有利条件，他以发掘、征集、研究、宣传苟坝会议为己任，在兼任县档案局（馆）局（馆）长、方志办主任的繁杂工作之余，努力钻研业务，为著书立说奋争不止，作为一位基层党史工作者，其业绩、精神，都使人感动和敬佩，难能可贵。

《寻找真理——苟坝会议十五问》虽然算不上历史巨著，但它作为专题著述，不仅有着存史鉴今和启后的重要作用，对于研究党史与军史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是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的好教材。

遵生国同志之嘱，为他的著述，也为纪念遵义会议 80 周年，写下以上感言，是为序。

遵义会议纪念馆原副馆长、研究员 费侃如

2014 年 3 月 9 日

苟坝会议概况

红军长征光辉的历史已过去了 70 多年。然而，在多数人们的记忆中，只知有遵义会议，不知有苟坝会议，多年来，苟坝会议会址因此而藏在深山人未识。

1935 年 1 月 15 日至 17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举行扩大会议，增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1935 年 2 月 5 日，在川滇黔交界的一个叫鸡鸣三省的村子，中央政治局常委进行了分工，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中央总的责任，毛泽东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中央红军二渡赤水，取得娄山关大捷，重占遵义城。在遵义战役中消灭敌 2 个师又 8 个团。3 月 4 日，中革军委决定设置前敌司令部，以朱德为司令员，毛泽东为政治委员，指挥红军作战。红军主力潜伏在遵义至鸭溪、枫香一带，伺机而动。3 月 10 日 1 时，一军团军团长林彪、政委聂荣臻向前敌司令部发出“万急”电报，提出要攻打打鼓新场（今金沙县城）。10 日上午，中共中央在今枫香镇苟坝村举行有 20 多人参加的政治局会议，多数人同意进攻打鼓新场，只有毛泽东一个人说坚决不能打。最后举手表决，通过了进攻打鼓新场决议。会后，毛泽东放心不下，半夜里提着马灯到周恩来处，要

周恩来晚一点发布命令，还是想一想。周恩来接受了毛泽东的建议，第二天再开会，把大家说服了。3月12日，经毛泽东提议，为了在瞬息万变的战争情况下灵活机动指挥作战，政治局决定成立以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军事小组”（本书除引文外，统一称“新三人团”），全权负责指挥军事，“在战争环境中，这是中央最重要的领导机构”^①。苟坝会议的作用主要有：一是因毛泽东坚决反对进攻打鼓新场，使中央红军避免陷入一场可能全军覆没的军事行动；二是毛泽东进入“新三人团”，表明毛泽东在全党全军中的领导地位得到进一步巩固，为后来形成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打下基础；三是继续和完善了遵义会议，



毛泽东



周恩来



王稼祥

是遵义会议的补充，使遵义会议后的组织整顿工作大体完成；四是进行了一次别开生面的民主集中制的实践，为党

^①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上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年版，第491页。

内民主集中制的建立和完善作了一次伟大的尝试。特别是毛泽东在会上敢于坚持真理的大无畏精神，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苟坝原名狗坝，狗坝之前曾叫水源坝，今属遵义县枫香镇苟坝村。全村共有 18 个村民组 3000 多人。苟坝地处遵义县之西端，距枫香镇政府 9 公里，距县城南白镇 40 公里，距历史文化名城遵义市中心城区 50 公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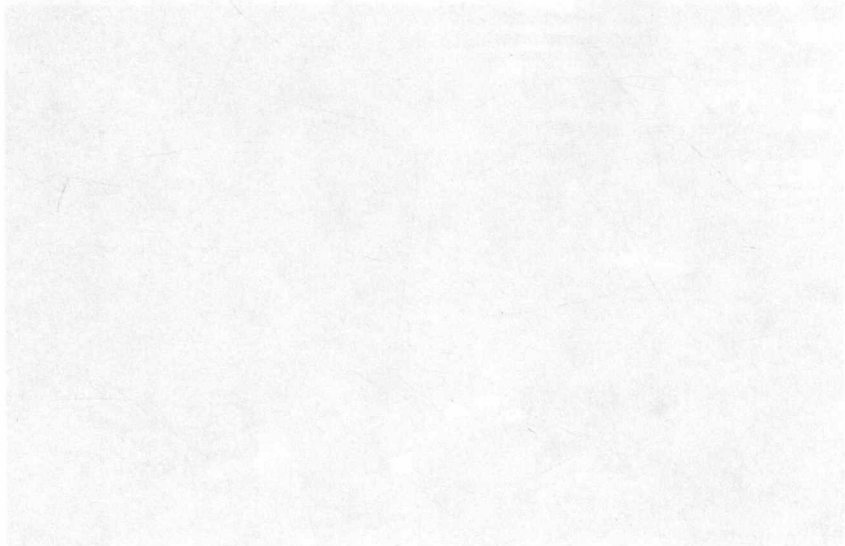
苟坝会议会址位于苟坝村马鬃岭山脚，主体建筑为中国农村传统的木结构瓦房，正房五开间，左右各建有两间厢房，前有朝门，组成四合院，面积 650 平方米。主体建筑已有近百年的历史。当地人称其为“新房子”。由于年久失修，正房和阁楼椽木破损，脊瓦疏落，雨天屋内多处漏雨。厢房格子窗破旧，冷风吹得满屋呼呼响。居住在这座四合院内的卢敏等 6 户人家，早就准备改造，当地政府考



苟坝会议会址

考虑到这座四合院具有特殊的历史背景，是中国革命史的重要文物而未允许。

2011年6月，苟坝会议会址在迎接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前夕进行复原性维修。继遵义会议前后的系列会议——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猴场会议、扎西会议的会址修复和保护之后，苟坝会议会址也以其厚重、古朴的风姿展现在世人面前。



为什么说是毛泽东亲自 为苟坝会议定名？

在毛泽东 1959 年八届七中全会的谈话未披露前，最先提出“苟坝会议”一词的，是中共遵义县委党史研究室所编《中央红军长征在遵义》（1992 年版）一书。此前各级领导的回忆录和有关研究文章提及这段史实时，均侧重于对“新三人团”于 1935 年 3 月成立时间、地点的探索和考证，未把 3 月 10 日开会讨论进攻打鼓新场、3 月 11 日又取消进攻打鼓新场的计划，3 月 12 日成立“新三人团”系列会议联成一个整体来认识，未明确提出“苟坝会议”的概念。

毛泽东在 1943 年说：长征途中，“在打鼓新场（应为苟坝——作者注）、洛甫每天要开二十余人的中央会议。洛甫提议要我为前敌总指挥……以后组成三人团（毛周王）领导。”从有关情况考证，毛泽东等中央领导未去过打鼓新场，讲话中提到的“打鼓新场”，显然是指讨论进攻打鼓新场的军事会议所在地。

1943 年，周恩来在谈到当年撤销进攻打鼓新场计划时说：在鸭溪会议上，“毛主席坚决反对那个军事计划，后来

还是停止了……自此以后成立三人团，集中军事领导，少开会议。”1972年，周恩来再次谈到这件事时说：“第二次从遵义出发，大家一致要打驻守在打鼓新场的敌人……会后……我接受了毛主席的意见，一早再开会议，把大家说服了。这样，毛主席才说，既然如此，不能像过去那么多人集体指挥，还是成立一个几人的小组，由毛主席、稼祥和我，三人小组指挥作战。”周恩来的两次谈话中，前一次说到是“鸭溪会议”，后一次只是说“三人小组指挥作战”，没有提出“苟坝会议”一词。

1978年5月18日，陈云在审查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陈列时，谈到三人军事小组成立的情况。他说：“成立三人小组是在遵义会议以后，四渡赤水时定的。大概在打鼓新场（应为苟坝——作者注）的地方。当时大家意见很多，就搞了个三人指挥小组。决议上没有。”显然，陈云的回忆也和毛泽东1943年一样，把苟坝误述为“打鼓新场”。

洛甫（张闻天）在1943年12月的笔记中也说：“在抢渡乌江以前，泽东同志提议以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三人成立三人团全权指挥军事。”

时任红三军团参谋长的叶剑英在1983年10月23日谈到当年成立三人军事小组的情况时说：“成立三人军事小组那个会我参加了，记得正在开会，敌人飞机来炸，我和毛主席还到茅草房去躲。”

从上述毛泽东、周恩来、陈云、张闻天、叶剑英等亲自参加苟坝会议的领导谈话和张闻天的笔记可以看出，他们都没有直接提出“苟坝会议”这个概念。

2003年12月，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所编《毛泽东

传》出版，记载了毛泽东于1959年4月5日在上海的讲话部分原文，我们惊奇地发现，毛泽东此次提出了“苟坝会议”这个概念，比我们过去了解的提出时间早了30余年。其原文是：

他说：“……大会都通过了，你来变更？这里有个观点不正确。有时大会也可以搞错误……我也有许多经验。比如苟坝会议（指1935年3月10日在贵州省苟坝召开的中共中央负责人会议，会议讨论了中央红军进攻打鼓新场的作战计划——原注），我先还有三票，后头只有一票……”^①

由此可见，苟坝会议是毛泽东1959年亲自定名的，并自己纠正了1943年把“苟坝”说成是“打鼓新场”的说法。1967年1月22日，毛泽东在中央军委碰头会扩大会议上讲话，再次提到成立“新三人团”的事。毛泽东在1943年（延安整风）、1959年（“大跃进”后）、1967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的几个特殊时期，在有关讲话中都提到了苟坝会议，说明苟坝会议在毛泽东心中印象深刻，很有分量、情有独钟，毛泽东对苟坝会议的巨大历史贡献最先作了肯定。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逢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939—940页。